

环保部发布《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

要说清潜在生态环境风险

□ 本报记者 李禾

■他山之石

美国“专车”管理规范

目前美国联邦没有管理Uber等打车软件的规定,而是由各州或者城市负责制定管理规范。Uber的管理规范体系借鉴了出租车管理的模式。

Uber和传统出租车在技术及其商业模式的不同导致一种全新公司的诞生,称之为交通网络公司(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y, TNC),这一概念由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所创。所谓“交通网络公司”,是指通过网络平台将乘客与私家车司机联络起来提供交通服务的公司。因此, Uber作为加州的TNC不适用出租车行业严苛准入标准,也无须承担高昂的成本。TNC只需要购买一种牌照,目前价值1000—10000美元不等,且目前在同一许可下使用该APP的司机并没有数量限制。

TNC的技术使得准入门槛很低,不太可能出现像出租车那样的垄断局面。目前政府没有出台法定的TNC费率表,因此它们得以自由定价,充分竞争。但是,唯一的要求是提供明确的费率表。此外,他们还可以展开促销活动,实行“分时定价”(surge pricing),即在高峰期时提高价格。

TNC对于司机的年龄、驾照、培训情况、背景调查、驾驶记录、保险等都有特殊要求。此外,每辆车享有100万美金的商业责任险,所有车辆都必须满足一定的要求,并通过年检。

美国有些城市限制Uber在机场接客,还有些城市要求支付机场费。那些没有为Uber专设公司类型的城市则彻底禁止Uber提供服务。

Uber司机被认为是独立承包商,但可能实际上处于兼职人员和独立承包商之间。Uber可能需要向司机提供联邦和州的福利,但是这一领域目前发展尚不健全。

范例:加州监管模式

加利福尼亚是第一个将Uber合法化并予以规范的州,对TNC这一新型公司类型在牌照和安全方面的管理亮点如下:

■不允许拥有用于开展服务的车辆;只能以实现安排好的方式搭载乘客;不允许以街边召车的方式搭载乘客。

■申请费为1000美元,许可有效期为3年,续期费用为100美元。

■必须为7座以下的车辆提供比低于100万美元的商业责任险,为10座以下的车辆提供150万的保险,受益人包括司机在内。承保范围不仅包括搭载乘客前往目的地的区间,还包括司机前往接客途中的区间。保险额必须能够赔偿索赔,无论司机的保险是否能够抵免某一部分的索赔。在司机开始提供服务之前,TNC必须获得司机提供保险证明,包括个人险以及商业超额责任险。

■TNC必须为司机提供驾驶培训,司机在提供服务之前必须完成这些培训课程。司机必须持有有效的加州驾照。司机必须年满21周岁。每一年TNC都必须获得司机的驾驶记录。对醉驾零容忍,醉驾司机将被禁止提供服务,并接受调查。必须通过全国犯罪背景调查,包括全国性犯罪名单。犯以下罪者不允许提供服务:吸毒后驾驶、醉驾、诈骗、性犯罪、使用车辆犯(重)罪、造成财产损失、盗窃、暴力或恐怖犯罪;危险驾驶(reckless driving)、醉驾、交通肇事逃逸以及驾照中止或吊销的。司机的驾驶记录上最多只能有三项轻罪。

■只能使用合法的小轿车、货车、小型货车、SUV、卡车、掀背式轿车、敞篷车等轻型汽车。车辆不能有明显改装。不能使用超过20座的汽车(在法律上被认定为巴士)。TNC所使用的APP必须向乘客显示司机和所使用车辆的照片。车辆应允许乘客说明是否需要一个可容纳轮椅的车辆。车辆应显示一致的商业外观(独特的标记或展示),足够大并且色彩分明,在白天50公尺之外能够识别。合格的商业外观包括但不限于在车门、车顶或隔板上的符号或记号。车辆需通过TNC和加州汽车修理局授权的第三方开展的年检。Uber公司内的规定要求车辆满足一定的类型或年份,不同城市的要求有所不同。

——摘编自腾讯研究院《美国如何监管“专车”》

■决策视野

□ 黄亚玲 黄明明

近年来,中央企业作为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科学和战略领域的创新主体,在4G通信、载人航天、蛟龙潜海、特高压、高速铁路等领域取得了大批突破性科技创新成果,自主知识产权数量逐年递增。然而,在创新获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中央企业仍然面临创新投入资金来源单一、科技人才缺乏长期激励、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不畅通等掣肘。究竟如何解决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创新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推出了系列政策措施。其中,资本与技术的双轮驱动是重要的实施路径。在今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金融创新的功能,发挥金融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助推作用。

国务院国资委5月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央企业2013年研发投入3188亿元,超过当年全国研发投入的1/4;拥有国家级研发机构610个,约占全国1/4;国家专利金奖总数的1/4由中央企业获得。这些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央企业对科研投入的加大。然而,创新投入资金来源单一、科技人才缺乏长期激励、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不畅通等问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央企业创新。

对此,国资委正在积极构建支持创新的投融资平台,通过设立中央企业创新投资基金等方式,筹集创新资本,转化创新机制,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的。目前,业界已达成的一个共识是探索建立中央企业创新投资基金,积极利用政府引导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拓宽创新活动的融资渠道,引入市场化激励机制,推进科技成果的

测数据作支撑,生态环保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还强调,应进一步拓宽信息发布渠道,以公众需求为出发点,改进信息发布内容,努力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环境监测“天罗地网”已初步形成

环境一号C星,与环境一号A/B星3星组网,形成了环境卫星“2+1”星座,实现了2—3天对全国覆盖一次的遥感监测能力,初步建成了天地一体化监测系统。环境监测工作实现了从手工到自动,从粗放到精准,从分散封闭到集成联动,从现状监测到预测预警的转变。

去年12月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平台基本建成,我国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重点区域中心均已建成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平台,并实现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业务化,空气质量预报信息在环保部官网上公开发布。

除环保部外,国务院水利、国土、海洋、农业、气象、林业等部门也根据各自管理需要建立了相应的监测网络,开展了地表水、地下水、海水、土壤、生态等领域的监测。

国家考核监测,确保数据真实性

促进了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改善。

为从制度层面保障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准确,依法查处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环保部还组织编写了《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及其配套的《技术判定细则》,对环境监测数据造假行为进行严格约束。今年年底,此《办法》及其配套办法将正式出台。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明确提出,全面设点,全国联网、自动预警、依法追责,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生态环境监测新格局。根据该目标,环保部已就国家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事宜与财政部达成一致,将分三步完成国家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监测事权的上收,真正实现“国家考核、国家监测”。

环保部称,环境监测事权全部上收国家后,能

■前瞻后望

开栏的话

对于一些重要事项的决策或决断,往往有诸多考量,甚或思想交锋;而其成败得失、效用影响,亦常令后人深长思之,叹之鉴之。今起本版开辟“前瞻后望”一栏,敬请读者朋友垂注。

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惨烈无比的世界大战。这两场战争于道德上讲或许是一种倒退,但的确也促进了代表20世纪特征的大科学的发展。按照英国科学史家帕特里西娅·法拉的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有毒气体和爆炸物的化学家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雷达、计算机和炸弹的物理学家战争。特别是“曼哈顿计划”主导下原子弹的出现,在终结二战的同时,亦将科学推进到了一个令人激动而又恐怖的时代。

这与20世纪30年代原子物理学研究取得的新进展和剑拔弩张的欧洲战事密切相关。当时,对不稳定元素的探索很快就引导科学家揭示出原子核裂变及链式反应原理——放射化学的创始人、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在1938年发现,某些重元素(例如铀)的原子核能够发生裂变。随即奥地利物理学家莉丝·迈特纳给出了理论解释,并通过计算出,

核裂变应放出大量的能量。

这一结论在科学界引发了剧烈的反响。1939年4月,德国化学家保罗·哈特克致信纳粹德国作战部,称核裂变将“多半有可能产生一种爆炸物,比传统炸药的威力高若干数量级……第一个利用它的国家将具有其他国家无法超越的优势。”这一年的夏天,德国专门成立了研究核裂变军事用途的研究所。同年9月1日,德国侵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远在大洋彼岸,逃出纳粹魔掌后来到美国的两位匈牙利裔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和尤金·维格纳(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更鲜明地预见到了核裂变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而且十分大胆地纳粹德国会抢先创制出那种威力巨大的新型炸弹。当时有秘报说,德国已禁止被其占领的捷克出口铀矿石,并可能会从比利时殖民地刚果将铀买回。西拉德想到他的老朋友爱因斯坦跟比利时于1939年7月16日驱车前往纽约附近的长岛,拜访了这位正在此地避暑的大人物。

爱因斯坦听西拉德解释完由核裂变释放出的中子,如何能够使铀石墨堆发生爆炸性的链式反应后,插话说:“我从未想到这一点!”接着他建议不如给他认识的一位比利时政府部长写信。这时维格纳提出异议:他们三人都是外来“难民”,不跟美国政府打招



进一步强化国家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能力,通过委托具有良好信誉的环境监测机构或第三方机构运行管理,从根本上避免监测数据受到考核评比等行政干扰。

建设大数据平台,联网共享统一发布

据《方案》,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基本实现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生态状况监测全覆盖,各级各类监测数据系统互联互通,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化能力和保障水平明显提升,监测与监管协同联动,初步建成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使生态环境监测能力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适应。全面做到摸清生态环境质量及变化趋势、说清污染排放状况、说清潜在的生态环境风险等。

为此,《方案》提出,加快生态环境监测信息传输网络与大数据平台建设,将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各地

据悉,环保部已完成了第一批国家直管站的第三方运维交接工作,重点加强了国控站的运行管理和在线质控,开展在线数据审核,对未按国家要求开展空气监测数据在线审核的省(区、市)进行了通报。

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进行联网共享,加强数据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在信息发布方面,依法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发布制度,实现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统一发布。

明晰责任也是非常必要的。《方案》规定,各级环保部门加大监测质量核查巡查力度,加强对各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业务活动的监管,严查故意违反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对党政领导干部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按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有关规定处理等。

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动议

□ 尹传红

呼就给一个外国政府写信谈论秘密的安全事务,恐怕不妥。商量的结果,是以爱因斯坦的名义给比利时大使写一封信,再给美国国务院写一封信。

几天后,西拉德由人牵线,拿着爱因斯坦的信见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朋友和顾问、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萨克斯。对方提出了此事的分量,提出应直接将信送呈白宫,并表示愿意亲自递交。于是,西拉德由另一位匈牙利裔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后来成为美国“氢弹之父”)陪伴,再次前往长岛,与爱因斯坦商议修改信件,直陈利用原子核的链式反应制造新型炸弹的可能性,并建议政府方面迅速采取行动。

然而,萨克斯迟至10月11日才有机会走进总统办公室。好在他很懂得谈话技巧,扯扯闲话就把他想表达的意思说了出来:年轻的美国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曾向拿破仑游说,要为他建造一种以蒸汽机驱动而不必用帆的新型轮船,这样他的舰队可以在任何气候条件下登陆英国。可法国皇帝觉得这纯属无稽之谈,把它擢到了一边。要不是,19世纪的历史进程恐怕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罗斯福听完这个故事,若有所思。萨克斯顺势将他在总结爱因斯坦信件、西拉德备忘录部分内容基础上专门撰写的一份800字概要,大声读了一遍。总统问:“亚历克斯,你是希望纳粹不会把我们炸掉?”萨克

斯答道:“正是如此。”罗斯福即刻招来私人助理,说:“我们需要行动。”

当天晚上,一个由国家标准局局长莱曼·布里格斯负责协调的专门委员会成立,还制订了规划。10月21日,轴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第一次会议,西拉德、维格纳和特勒(三人后来被戏称为“匈牙利阴谋集团”)应邀出席。会议开始,西拉德指出,为了形成一次链式反应,需要拨款去进行实验,还要获得铀和石墨的供给。可是,出席会议的陆军和海军代表却表现出相当的冷淡,言语中甚至还带着蔑视和讥讽。

起初项目进展很慢,维格纳抱怨说政府工作“就像是在糖浆里游泳一样”。1941年12月6日,美国政府下定决心,正式大量拨款研制原子弹,启动了超级保密的“曼哈顿计划”——这是世界上通过立法实施的第一个大科学项目,逾千科技精英陆续参与进来。第二天,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也终于将美国拖入战争。4天后,德国对美国宣战。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任务比全面研制原子弹更重要了。科学、政治、工业和军事利益由此完全交织在一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成为“制度化战时科技”的第一个成功范例。

央企创新基金如何从体制上突围

产业化和商业化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中央企业在体制机制上的特殊性,还面临一些现实问题,比如社会资本的持股比例、员工持股、知识产权的评估等。

结合我国当前的政策和法制背景,中央企业在引入基金助推创新时还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做出一些突破:

一是选取试点企业,剥离科技创新部门,设立专门子公司。当前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国有资产流失、员工持股等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本市场在融资渠道、股权激励等方面发挥有效功能。为此,建议选取完全竞争功能的中央企业作为试点,剥离科技创新部门,设立专门子公司作为创新主体。子公司可以采取母公司控股的形式,引入其他资本参股。设立子公司有以下几个好处:首先是隔离子公司的创新风险;其次是在子公司层面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创新活动上按市场化机制来运营,深入借助资本市场来拓宽创新活动的融资渠道,比如

公开发行股票、债券等;第三是可以有效提升创新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市场化的人才激励和管理机制,在员工持股、产权交易、收益分配等方面实行市场化运作,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是引导创新基金去行政化。实际上,早在2002年我国就设立了第一家政府引导基金——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截至2013年12月,政府共成立189家引导基金,累计可投资规模高达1000亿元以上。但是从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的实际运营情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主要问题在于引导基金本质上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在运作机制上还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比如地方政府对其投资范围仅限制于本地,导致基金资金出现沉淀、闲置现象,资金利用率低下。不可否认,在科技创新活动初期,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本聚集发挥了杠杆的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应该让社会资本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主导的作用。“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政府引导基金要突破这种局限,必须去行政化,引入市场化团队管理基

金,政府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基金管理,从基金设立、筛选项目、投后管理、激励机制再到退出等,一律采用市场通行规则,让政府引导基金真正发挥资金引导的作用。

三是允许政府出资的引导基金在交易所挂牌交易。创新活动具有投入大、周期长等特点,尤其是重大领域基础学科领域的创新,其风险和收益的不确定性更高,在早期投入阶段面临的融资难度更大。因此,仅仅依靠减免税负、财政补贴、贷款优惠等财政激励措施并不足以保证社会资本的投入创新,引导基金的积极性和持久性。允许政府出资的各类创新基金在交易所挂牌交易,至少发挥了资本市场的以下几个功能:其一,吸引公众参与,拓宽基金融资渠道。其二,提高了基金份额的流动性。创新基金出资人的持有份额在非公开市场的流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合基金(FOFs)市场的发展成熟度,而我国目前组合基金市场还处于萌芽阶段,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创新基金份额的流动性。通过在交易所上市,基金份额可以自由转让,流动性得到

了补充。其三,提高基金与创新活动的匹配度。如前所述,创新基金具有周期长、投入大等特点,非上市的基金通常具有固定的存续期,在我国通常是在5年左右,给基金管理人带来短期内完成投资额的压力,出于基金收益率和声誉的考虑,管理人常常被迫选择短、平、快的创新项目,而这显然不利于那些周期长的创新活动。基金在交易所上市后,在保证短期内完成投资额的同时又保证了基金规模的稳定,从而保证了长线资金的供给。

金融资本是创新活动早期必不可少的资源,对创新活动的促进能否发挥多大的作用还取决于外部环境和制度,换句话说,政府应该构建有效的金融制度和法制环境为技术培育和科技发展、创新成果商业化转换提供必要的支持。金融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政府应该在弥补创新活动融资缺口中发挥引导作用,在建立公共融资计划、投资基础设施、加强金融创新、完善外部法制环境中发挥主导作用,进一步鼓励研发和创新活动。(作者单位:国资委研究中心)